

实用奇谋大全
（上）

智囊补

张建国主编



97071

DH10

智囊补

实用奇谋大全

上

张建国 主编



200125257

气家出版社

0204
01:1

97672

0410/26

智囊补

实用奇谋大全

下

张建国 主编



200125284



包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囊补实用奇谋大全/张建国主编.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1

ISBN 7-5029-2147-8

I. 智… II. 张… III. 个人-修养-通俗读物
N. B825

气象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46号 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陈云峰 郭彩丽 终审:周诗健

封面设计:陈云峰 责任技编:都平 责任校对:时人

*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气象出版社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5 字数:1643千字

1997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20.00元(上、下册)

关于冯梦龙和他的《智囊补》 及其在今天的运用

(代前言)

生活在大厦将倾的明末的冯梦龙，向以通俗文学家著称于世。他晚年精心蒐集编辑的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后世合称《三言》)，几百年来，既受到历代通俗文学家和小说家普遍的重视和欣赏；同时，又更为中国都市里的市井阶层和平民百姓广泛地垂爱和研读，而成为他们居家必备的消闲读物。但他晚年“周览古今成败得失”而潜心编纂的一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智囊补》，长时期以来却被世人所忽略而不甚了解。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冯氏在通俗文学普及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掩盖了他晚年对于古今政客和智囊出类拔萃的奇谋研究的成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恐怕也是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其愚民政策而有意识地禁锢这本书在世间流传大有关系。今天的社会是从昨天的社会发展而来，而现在的社会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了竞争和斗智的社会，因此，现代人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经验教训，使之“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柳宗元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是客观之可能，而且亦是现实所必需。有鉴于此，本着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批判扬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我们适时而慎重地向大家推荐介绍冯氏的这部《智囊补》，应该说是有

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

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曾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磨磨外史、缘天馆主人、无碍居士等,明末苏州府长洲里(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清世祖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封建社会鄙视小说家的偏见所至,清人所修的明正史里没有冯氏的一席之地,同时代的文人似也没有想到为这位享誉一时的小说家作“年谱”,或“墓志铭”什么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他的情况了解甚少。只是由于他曾干过一任寿宁知县,故在《苏州府志·人物志》中,有一段关于他的小传说: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禎时,以贡选寿宁知县。”此外,在当时人的著述中,还可以找到有关他的只爪片鳞。

冯梦龙的祖上大约与嘉定世代为宦的侯峒曾家、苏州的大儒王仁孝家有过往来。他还有一兄一弟,兄名梦桂,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弟名梦熊,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太学生,有诗文传世;至于冯氏本人,从小就受到过严格系统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育(参见冯梦龙:《麟经指月·发凡》),友人王挺誉其“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挽冯梦龙》),以及上述所引《苏州府志》的赞辞,再从他所编纂的《三言》、《情史》、《古今谭概》、《智囊补》等著述中,可见这些并非仅仅是溢美之词。冯氏兄弟三人当时并称为“吴下三冯”,据此推知,冯梦龙的家庭不会是当地的一小户人家,而至少应为一般的士宦家庭才对。

冯梦龙从小就颇有才气,很为同时代的青年人所推崇和景仰(文从简在《冯梦龙》中称其是“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曾苦读《四书五经》,应举赶考,企图从这里走上飞黄腾达、获取功名的康庄大道,如从他取字“子

犹”这一点上来看,就足以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远大志向(子,据《广雅·释言》注曰:“子,犹也。”犹,据《水经注·江水源》注曰:“犹,兽名,似猴而短足。好游岩树,一腾百步,或三百丈,顺往倒退,乘空若飞。”“子犹”二字似应出于此。陆树仑先生在《〈三言〉序的作者问题》里说:冯氏取“子犹”为字,如取“犹龙”为字一样,“是在激励自己治学,应如龙乘云,似犹腾空,进退往返,变化莫测。”)。然而,由于他博览群书,思想激进,又颇为自负,不愿受到传统教育的束缚,因此,屡屡名落孙山,鹏程远大的理想无法实现与严酷无情的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使得青壮年时代的冯梦龙内心世界极为抑郁,只得整天地把酒消愁,出入青楼酒馆去寻花问柳,故有过一段时间“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狎妓生活(王挺:《挽冯梦龙》)。此时,他倒真的热恋过一个“美容止,善谐谑”叫侯慧卿的名歌妓(冯梦龙:《桂枝儿·注》),两人在一起卿卿我我地度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但后来,侯氏迫于某方面的压力,决定从良嫁人,最终与梦龙挥泪惜别。与侯慧卿恋情的失败,给予冯氏感情上以极大的打击,他痛不欲生,大病了一场。在悲怨与思念交织的情绪下,他分别写下了《怨离诗》、《怨离词》等散曲,抒发了自己那“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断魂”的怨悔恋情(《怨离诗》),不过,最后他还是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冯梦龙的友人董斯张说:“子犹自失慧卿,道绝青楼之好。”(《怨离词·评》)此外,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还给予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以巨大的推动力,他倾以极大的热忱编纂的两部民歌集《桂枝儿》和《山歌》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冯梦龙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在其编纂的以讥讽封建社会里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谰道奸商等为主的《广笑府》和《笑府》中,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自己的用意就在于:“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伎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富贵、功名、道德,这些为封建士大夫们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竟成了冯梦龙冷嘲热讽的对象,这充分

体现了他嫉恶如仇和玩世不恭的叛逆立场,也映衬出了他那独具一格的“笑骂成文章,烨然散霞绮”的诙谐个性(王挺:《挽冯梦龙》)。他公开反对自宋元以来一些伪善的道德家们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理论,在《情史·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宣言自己编纂的目的,就是“欲立情教,教谕诸众生”,让天下人“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其立意之脱俗、胸襟之坦荡、语言之大胆,在当时那个虚伪腐败的明末社会里,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屈指可数的了。他的文友榜之焕曾感慨系之:“然则谭何容易?不有学不足谭,不有识也不能谭,不有胆也不敢谭,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撼也,亦不欲谭。夫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以代舆人之诵,而刺亦不逮分校之公。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也。”(《古今谭概·序》)至于所编纂的《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今古奇观·序》),其主要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它们来劝喻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

冯梦龙虽然自恃才高,但屡考屡败,却又摆脱不了封建士大夫们名登仕籍、光耀祖宗的羁绊,终于选择国子监为进身之阶,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他57岁时入国学,成为一名贡生,大约在次年便破例除授丹徒训导。四年后,又擢升为福建寿宁知县。又过了四载,一任秩满,冯氏便离开了寿宁,归隐苏州。在任期间,由于他实实在在地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所以,《寿宁县志》将他列入“循吏”(清官能吏)的传记里(参见本书第三卷“龚太守治盗有方”一文“简评”)。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俭自缢在煤山上,由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苦心建立起来的朱明王朝,如摧枯拉朽般地一举被推翻了。此时冯氏这个受到几十年封建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站在维护旧王朝的立场上,将这件事视作“天崩地裂”之变,陷入了如丧考妣的“悲痛莫喻”之中。尽管冯梦龙年逾古稀且身体羸弱,已不能亲临边疆去为明王朝的中兴搏杀奋斗,但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

强烈责任感,促使他拿起自己的那特殊的战斗武器——笔来,为明王朝的苟延残喘而摇旗呐喊。这期间,福王朱由崧等先后被拥戴称帝,这给冯氏那干涸的心河里送去了一股脉脉温情和暖流,为此,他先后编纂了《甲申纪事》和《中兴伟略》,以为“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贡献微薄之力(冯梦龙:《中兴伟略·小引》)。冯梦龙甚至还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先后出游吴江、绍溪、武陵等地,为拯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四处奔走,为抵御清兵的大举南侵而奋起抗争,他多么希望能“以余年及睹太平”,即亲眼看到明王朝的中兴啊(《中兴实录·叙》)!

遗憾的是,冯梦龙所寄予厚望的福王等王及其辅臣,均是一班昏庸无能的窝囊废,在灭国亡朝的严重威胁下,他们不仅不思振作,反而苛敛民财,卖官鬻爵,贪图享受,荒淫无度,排斥异己,残害忠良,弄得人心涣散,民怨沸腾。就这两三个不堪一击的南明小朝廷,最终还是被引兵南下的清将多铎一一收拾了。清世祖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具有汉代循良道行和晋士大夫风范的冯梦龙,在他73岁时,怀着满腔悲慨,与世长辞了。

二

冯梦龙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明王朝覆灭的前夜,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正直知识分子,他凭藉着自己敏锐的直觉不能不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也意识到自己无力补天;但从维护一个已运转了二三百年的朱明王朝的立场上出发,在看到朝廷内外不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同时,他又屡次幻想着会出现大明盛世时的圣君明臣,来运用他们那救国治民的超人胆略和智囊,去调动社会上一切潜在的各方豪杰和抗清力量,挽回明王朝即将灭亡的可怕命运。《智囊补》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智囊补》原本书名为《智囊》,它是冯梦龙于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54岁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编

纂而成的。据冯梦龙《智囊补·自叙》和《苏州府志·艺文志》所云：《智囊》初为二十七卷，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这种版本。是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极为畅销，于是，一些朋友便怂恿冯氏再续编一部《智囊》，然而，此时处于风烛残年的冯梦龙已是手脚迟钝，头昏眼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好将自己“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有诸胸臆”（《智囊补·自叙》），即对原篇目作了若干调整，并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篇目，在内容上做了部分的修正，对按语也进行了一定的增删，然后改名为《智囊补》重新付梓，致使全书扩充为40万字左右。

增补修订后的《智囊补》，可视为是冯梦龙晚年呕心沥血编纂的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搜罗宏富、篇幅庞大的智谋锦囊。冯氏以“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为编纂宗旨（《智囊补·自叙》），搜集了从先秦至明末三千多年间经史百家、稗官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之中2000余则以智取胜的事例。所记的人物三教九流、多种多样，既有帝王将相、守令县吏、富绅商贾、名儒侠客、僧侣道士，又有农夫雇工、店员小贩、走卒仆役、弱妇幼孺、市井百姓，甚至一代奸雄、狡黠讼师、欺诈方士、谰僧壁盗、地方恶棍、狡童竖子。所叙故事，上自治土安邦的经国大略，治军作战的用兵之策，决讼断案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明算计，立身处世的生活锦囊，逢凶化吉的机敏权变；甚至于宠宦奸臣的阴谋诡计，损人利己的狡黠小慧，“惟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语”（李渔：《智囊·序》）。所叙谋略智囊，共十部二十八卷，每部前有总叙，每卷前有题诗，于史料辑录之外附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评述和按语，故“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冯梦龙：《新列国志·凡例》）。由于冯梦龙的思想深受李卓吾唯物和民主思想的影响，这就使得他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儒学礼教观念的束缚，摒弃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德家呆板、迂腐的乏味说教，因而显示了一种较为难得的“无有怀而不吐”的平易自然、

求真务实的创作风格,较能充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需要。这种将朝廷庙堂治国牧民的智谋锦囊推荐公诸社会最下层的平民百姓的卓越胆识和超人勇气,既与当时那班标榜“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划清了界限,又为后世一些潜心研究渊源流长的中国智囊的学者们奠定了基础。

《智囊补》不仅最大限度地囊括了冯氏当时及以前的智囊故事,而且在自叙、总叙、题诗、按语中,注入了编纂者“资治智囊”的政治倾向和“执方疗疾”的思想感情,许多真知灼见启人深思,“令聋者聪,瞶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汪本钊:《续刻李氏书序》)是我们研究晚年冯梦龙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宝贵资料,当然,限于篇幅,本前言不可能就这一问题展开评述,下面仅在简叙《智囊补》全书时谈谈自己的点滴心得体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智谋锦囊是帝王将相、守令县吏独占的“专用品”,平民百姓岂得染指?冯梦龙却回答说:非也!在《智囊·自叙》里,他开门见山地宣称道:“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因此,他欲使“下下人有上上人智”(参见本书第一卷“秦桧以官伪书人”一文“按语”),公然宣言要以智启人,而与几千年传统的以礼愚人相对抗。为此,冯氏将古今运用智囊的事例以及自己对智囊的认识,分别归类出全书的结构如下:

上智部:(1)见大,(2)远猷,(3)通简,(4)迎刃;

明智部:(5)知几,(6)亿中,(7)剖疑,(8)经务;

察智部:(9)智情,(10)诘奸;

胆智部:(11)威克,(12)识断;

捷智部:(13)灵变,(14)应卒;

术智部:(16)委蛇,(17)缪数,(18)权奇;

语智部:(19)辩才,(20)善言;

兵智部:(21)不战,(22)制胜,(23)诡道,(24)武案;

闺智部:(25)贤哲,(26)雄略;

杂智部:(27)狡黠,(28)小慧。

这种分类,今人观之,或许有其杂乱无章、不尽合理、大可商榷之处,但它毕竟是沉寂的天空中的一声炸雷,昏睡的长夜里的一道闪电,其首功不可没!

在《上智部》里,冯氏认为:智囊的最高境界当是“以恰肖其局”。上智者看似“无心而合”,其实“非千虑所臻也”。以此来印证他在《自叙》中所言:“智犹水,然藏于地中之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作者通过“韩琦巧解皇室矛盾”赞叹了北宋鼎盛时,君臣得以面对,“肺腑所以得馨”的君臣情谊互洽的信任关系,而暗讽了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大疑臣下,结果导致了朝政腐败、国将不国的黑暗现实,故大声疾呼执政者要“取大”“视远”,勿贪近利,能在“危峦前厄,洪波后沸”的重重社会危机之中“出其不意,游刃有余”。类似这样的政治见解,几乎散见《智囊补》的各卷之中,但以《上智部》、《明智部》等前几部最为集中。

在《明智部》里,冯氏分明是给明末最高的统治者打气道:“圣无死地,贤无败局”,倘若能在“独目迷津,弥天毒雾”的情况下,决疑解难,驱奸任贤,定能迎来“太阳当空”的大明盛世。他十分欣赏战国时的西门豹巧制妖巫的智囊,称赞其“伟丈夫”的大将风度;他高度评价了唐代的大理财家刘晏为国理财、为民分忧的“循吏”精神,认为鉴别一个官吏的好坏,关键是要看他能否迅速地斩断“错节盘根”,这很像当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

在《察智部》中,冯氏颂扬了“明察并举”的虞舜,提出“非明不能察,非察不能明”的著名论断,指出吏治最显著的标准是:“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他将前代的官吏与现在的官吏作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之后,认为现在的官吏腐败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令出钱纳吏,以吏为市耳,令访狱便鬻狱矣;说官之心犹

吏也，民安得不冤！”如此犀利的批评在那个时代似不多见，这对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廉政建设也不无裨益。

在《胆识部》里，作者首先确定了胆识与智谋在客观世界中的位置：“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其次分析了智谋与胆识之间的因果关系：“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他称赞了况钟勇于为部下揽过的自我贬抑的佳行，揭示了明末为吏者的自私：“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过乎？”他批评诸葛亮在用魏延这个人才方面胆识太小，“未免虑之太深，防之太过，持之太严”，如联系到当时崇祯皇帝这方面的问题来看，当是有的放矢。

在《术智部》里，冯氏生动形象地阐述了策略(术)与智谋之间的辩证关系：“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轡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崖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他号召人们学习动物的“以屈求伸、以伏待飞、以退为进”术，并设身处地地为同时代的忠臣周忱委屈求全而正名伸冤，替唐顺之等人逆中求顺但不为时人所理解而扼腕痛惜，如能联想到周恩来总理在“十年动乱”中的任劳任怨、砥柱中流，当能领会忠臣难为的窘迫现实。冯氏在肯定孔夫子“大信不信”的观点的同时，嘲讽了那些庸儒的“温云立杀”。即便是对千夫所指的奸相秦桧，他也能不因人而废智地肯定其“亦尽有应变之才”。

在《捷智部》里，冯梦龙强调了把握时机的重要性，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认为有时“一日百战”，但其“成败如丝”；纵然“三年造车”，或许“覆于临时”。因此，一个出色的执政者要在“如火如荼”的事变中，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灵活的反应力。

在《语智部》里，他精辟地阐明了“语智”的重大作用：“谈言微中，足以解纷”；“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他十分赞同张嘉言平息兵变的说服技巧，无不欣赏晏子讽谏齐君的谏君策略，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他渴望这

类贤臣良吏出来辅君救世的迫切心声。

兵不厌诈,智谋在军事上的灵活运用是不言而喻的,两军相争,常见的更多的是以智取胜。故在《兵智部》里,冯梦龙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军事智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批评了那些自诩清高的“言兵恶诈”的腐儒书生,并以历史上那些以智取胜的圣君贤臣和以愚遭败的昏君蠢臣为例,总结道:“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或以势而胜。总之,“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

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所组成的,故“妇女能顶半边天”。冯梦龙所设置的《闺智部》可见其独具匠心,他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传说中那些贤惠聪明、智勇双全的杰出女性,驳斥了封建社会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歧视女性的陈腐观念,冯氏进步的妇女观在这里大放异彩。

冯梦龙在《智囊·自叙》中曾批驳当时一些正统文人对于他网罗“神奸巨猾”“鸡鸣狗盗”的诈术颇有微词,他义正辞严地反问道:“虽奸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推茧,而蚕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故在书末专门列了《杂智部》,意欲使正人君子 and 善良人们“破其狡”“识其小”。处在“机械变诈之心,每随文明之程度而俱进”的现代社会里的人们,今观所惜,或许还嫌此一部分内容太少!

由于冯氏所处的时代及其世界观的局限,因此,如同作者其他的作品一样,他用来启迪人们的,并不完全是进步的思想,而其中的封建性糟粕也在所难免,譬如,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对于少数民族的鄙视态度,对于社会下层人士的正当反抗的极不容忍,对于王安石变法的错误评价,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封建道德、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这都是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借鉴时应当仔细甄别辨析的。

三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谋略,长于思辨,理性大于感性的智慧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涌现出了以吕尚、孙武子、张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谋略家、军事家、纵横家。周初的姜太公,被公认为是中国谋略学的开山鼻祖,周武王伐纣得以成功,多出自他的深谋算计,故司马迁称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史记·齐太公世家》);孙武子作为一代大军事家,其不朽著作《孙子兵法》被历代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视为东方的《圣经》,而加以潜心地揣摩与演绎;至于苏秦、张仪等师承鬼谷子的“飞箝抵巇之术”“捭阖张翥之资”“察人心之理,明变化之朕”“以内符应外摩”(参见本书后附录的张明弼与沈几的《智囊·序》),凭藉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时而说动东方六国合纵抵御暴秦的大举东进,时而挑拨东方六国连横秦国而自取灭亡,从而改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也为后世的纵横家、政治家倾慕不已,奉为神明;“秦汉以后历经魏、晋而南北朝历史人物,慧黠者口说春秋大义而阳用《左传》、《国策》之权谋者,代不乏人,尤其以魏蜀局势,最为显著。于是初唐之际,而有赵蕤著《长短经》之作,评议古今,昭示正反之旨,其于三国权谋,尤所议论”;“顺沿而至明末,则有李卓吾辈之崛起,攻讦历史,揭櫫用经用权之谈;骚然于学术之林;一变再变,复有冯梦龙等《古今谭概》、《智囊补》等之作,……言賅意长,借词比事,往往深含夫人微言大义之旨,以示权谋韬略之可用与不可用,以彰善善恶恶之分齐,必须慎思明辨,才参得其圈中”(台湾)南怀瑾:《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前介》);及至近代为世人所挖掘出来的《三十六计》等智谋、兵谋奇书,不仅受到倍感谋略之重要的国人广泛的研读和诠释,而且也引起了东方及至整个世界各方面人士的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今冷战较为宽松的和平时代里,各敌对国更多的是进行情报战、经济战、科技战、外交战等,换句话说,也就是以智取胜。所以,日、美等国的一些企业家、军事家、科学家、外交家等,都如同是发现了一座吾国人们所

熟视无睹的富矿似地,挖掘翻译整理中国古老的谋略学的著作,掀起了一股竞相研究中国谋略学的热潮,以便期望从中寻找到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智谋锦囊。究其动因,这当然是与他们汲取各自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有关。如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之一,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加之在地域上像是一个浮在大海上的“孤岛”,又没有多少可资藉用的能源,但大和民族国民很有点如同孙武子所说“背水一战”的胆识与气魄,日本企业家还将《孙子兵法》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结果,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不过几十年,日本就再次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再如,美国一向有“国际宪兵”之“誉称”,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官方主战派根本无视刚刚获得解放的“东亚病夫”的严正警告,断言中国不敢出兵,而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德林公司的研究结论却恰好相反:“中国将要出兵!”该公司欲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政府,却遭到了拒绝,那后果便是:美国侵略者惨遭中朝两国军民的迎头痛击。战争结束后,后悔不迭的美国政府便以280万美元的高昂价格买下了这个早已过时的研究成果。又如,据说美伊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没有小瞧伊拉克这个中东的石油大国,要求参战的将士熟读《孙子兵法》,并在正式攻击之前——如同《孙子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战、情报战、心理战、间谍战等,给世人的印象是,自己是个“王者之师”、“正义之师”,几欲“不战”而使伊拉克国民俯首称臣的了,战局的结果当如美国“庙堂”所算。近年来,日本许多大公司、大企业都规定下属管理人员必须学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还要求学生们必须熟背《孙子兵法》中的某些章节。这对于有志于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个难以避免的“核冲击波”。世界即将跨入崭新的21世纪,大国、强国尚且有如此“落后者要挨打”之忧患,而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奋起直追中华民族岂能等闲视之?吾国亟需一大批富有远见卓识、深怀智谋锦囊的“风流人物”!吾国亟需更多更好的整理古代谋略卓有成效

的出版物!以此来唤起“东方睡狮”的国民的智慧才干,爱我中华,壮我中华;以此在当代世界的竞技场上施展拳脚,纵横驰骋。

自从《鬼谷子实用智谋大全》出版以后,承蒙读者诸君的厚爱,多次再版。在气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陈云峰先生等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我们今不吝浅陋,特地组织了一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精心地译注,并附以详尽的评解,隆重地推出这部集中国古人的高超智谋锦囊和当代学者独到见识于一体的旷世奇书——《智囊补实用奇谋大全》,以期对于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教育、科研、生产等各项工作的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智谋锦囊,尤其是对于今天刚刚离开校门、踏上社会的莘莘学子谋职择业、为人处世提供一部可资参考的谋略宝典。编者再次诚恳地期待着读者以及各方面人士的不吝赐教。

张建国

公元1996年7月17日

于喻家山下